



# 清代四川清诗总集编纂群体考论

王虎 王梅

**摘要:**清代四川编纂诗歌总集之风盛行,编纂的清诗总集不仅数量众多、类型丰富,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名家之选。在四川清诗总集的编纂者中,士绅是无可置疑的生力军,他们之中既有入蜀的流寓官员,亦有在外宦游的川籍官员,还有悬车回乡的耆旧,以及川省本地的落魄举子。除士绅以外,蜀中亦有许多方外人士积极投身诗歌总集的编纂活动。这些编纂者身份、阅历以及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他们在进行编纂工作时有着不同的宗旨与目的,最终形成了四川清诗总集多样的面貌。

**关键词:**清代四川;清诗总集;编纂群体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621

**收稿日期:**2023-01-1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四川清诗总集研究”(22BZW1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虎,男,四川绵阳人,文学博士,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巴蜀文学与文献,

E-mail: wangjialin439@163.com;

王梅,女,四川南充人,四川师范大学附属青台山中学教师。

清代各地编纂诗歌总集之风盛行,四川地区也不例外。四川清诗总集不仅是研究清代四川文学和历史的珍贵文献,也是清代文学和史学的重要旁证。四川清诗总集不仅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并且产生了许多有着全国影响力的名家之选,诸如《蜀雅》、《国朝蜀诗略》、《国朝全蜀诗钞》等,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近年来,随着对巴蜀文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学界对四川清诗总集也开始予以更多的关注,从不同视角展开了对四川清诗总集的研究<sup>①</sup>。但目前学界并没有对清代四川清诗总集的编纂群体作专题性研究,相关成果亦暂付阙如。而四川清诗总集之所以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关键在其编纂群体的身份地位、诗学观念以及生活阅历的复杂多元。故笔者不揣鄙陋,拟对清代四川清诗总集的编纂群体进行辨析,以求教于方家。

## 一 入蜀官员

清代入蜀官员虽非四川籍,但在川为官便守土有责,地方文教风治是其分内之责。丕振文风、凸显治绩正是入蜀的外省官员编纂当地诗文总集的指导思想,因此他们编纂的清诗总集多以课艺类为主,如河南进士程祖润就任四川新繁县令便辑有《繁江课艺》。

程祖润,字雨琴,原名锡书,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进士,以知县分发四川,历署合州、广安州及新繁、江津等县,后总办川东防剿军务,授成绵龙茂兵备道,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卒于任上,终年56岁。道光三十年(1850)程祖润由广安调任江津,莅任后“大开坛坫,提唱风骚,一时远近来学者,不下百数,陶令好文,

<sup>①</sup>参见:王虎《张邦仲〈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07—117页;徐婷《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王钟玉《李调元〈蜀雅〉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孙文周《论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及其诗学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71—76页;李思婧、吴洪泽《〈全蜀诗汇〉是伪书》,《巴蜀史志》2022年第2期,第88—91页。

庾公爱士,为盛朝二百年来守令未有之事”<sup>①</sup>。程祖润公暇之余常于书院讲学,培植后学,勤于课士,辑有《繁江课艺》。光绪《丹徒县志》载:“(程祖润)课书院必亲阅,每加改正,刻《繁江课艺》行世。又捐俸添置膏火。公退之暇,复进诸生于考棚,设帐教诲,视若子弟,励品论文,培植寒峻,学者皆称雨琴先生,若不知为地方官也。”<sup>②</sup>程祖润之所以选辑《繁江课艺》,一方面是出于奖掖学子,培植士风的目的,但亦有标榜治绩,以作晋升之资的意图。民国《新繁县志·张谨度传附孙汝玉传》中记载的一则轶事便很能说明问题:

(张)汝玉字琢之,幼聪颖,数岁即能诗,乡先生咸器之。年十七,莆田郭尚先督学四川,拔置县学第一。凡秋试十三,皆不第,作《秋闱词》以寄慨,士大夫争相传写。……汝玉为诗,以艳丽刻画为宗,其沉郁顿挫之致,论者以方遂宁张问陶焉。年五十七卒,有诗集二卷,词一卷,杂著一卷。初,邑令程祖润以名进士宰繁,听讼之余,集士讲学。汝玉方以才名,祖润欲致诸门下,汝玉不屈。适文庙鸩去,遂赋《招聘词》以讽之。祖润大怒,缉捕之,汝玉亡去,竟客死不返云。<sup>③</sup>

张汝玉作为新繁一方名士,才华出众但却久试不售,心中自然难免有不平之气,程祖润到任后听闻其名,欲将其招致门下,除其看重张汝玉的才气之外,亦有借此拉近与新繁本地士绅关系的念头,不料却遭到张汝玉的拒绝。更让其难堪的是,张汝玉竟然还借机讽刺其亲近士子、捐廉劝学的门面行为,程祖润对此十分恼怒,下令缉捕张汝玉,导致张汝玉不得不流亡他乡,最终竟客死在外。若程祖润是真心爱才惜才,便不会因为张汝玉的几句讽刺诗而恼羞成怒,其之所以要大动干戈缉拿汝玉,无外乎是担心其《招聘词》刺破其勤政爱民的声名,对仕途造成不利的影晌。正因如此,可以推断其编纂《繁江课艺》必有凸显地方文治,为自己晋升赚取声名的目的。

清代入蜀官员编纂的课艺类总集还有谭宗浚编纂的《蜀秀集》、王闿运编纂的《尊经书院初集》,以及刘岳云编纂的《尊经书院三集》,其中又以谭宗浚编纂的《蜀秀集》最为典型。

谭宗浚,原名懋安,字叔裕,广东南海(今广州市白云区)人,其父谭莹为琼州府教谕。谭宗浚少承家学,聪敏强记,16岁便中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榜眼,光绪二年(1876)入川继张之洞之后为四川学政。《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称其“任四川学政时,培植英才,提倡实学,得人最盛,刊有《蜀秀集》。蜀人以何子贞、张文襄及公称为‘三贤’”<sup>④</sup>。谭宗浚就任四川学政后,注重实学,反对空疏华丽的文风,悉心培养士风,他从四川全省生员的上千篇作品中辑选出《蜀秀集》九卷,卷一至四为经说杂考,卷五为杂文,卷六、卷七为赋,卷八、卷九为诗。宣统《南海县志》载:“(谭宗浚)督学四川,风裁峻整。任满时选诸生诗文为《蜀秀集》,风行海内。”<sup>⑤</sup>《蜀秀集》刊出后,不仅对近代四川文学有着重要影响,亦引发了四川地区的学术振兴。屈守元就指出:“《蜀秀集》可以说是19世纪空前绝后的一部结集四川知识分子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总集,它引起了近世蜀学的振兴。”<sup>⑥</sup>

《蜀秀集》的诗歌部分虽然只有两卷,但编排却极有特色,采用了清诗总集中较为少见的分题编排的方式,首排以尊经书院季课拟谢康乐组诗,后依次为拟《选》体诗、拟唐诗、拟苏轼诗和拟杜甫诗,最后两组分别为《论蜀诗绝句》与《前后蜀杂事诗》。此种别出心裁的编排方式是为了扭转清代四川举子生员诗风中存在的弊端。诗歌发展到清代,格律声韵体系已经十分严整,大部分诗人在创作中也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但清代巴蜀地区的诗人却是一个例外,乾隆《大竹县志》便记载:

诗以言志,篇章所著,性情见焉。……竹邑士子素不讲音韵,而又地居荒僻,前贤足迹罕到,题咏甚少,旧志亦缺而不载,谨就残碑断简目中所见者,汇为一帙,其工拙固所不计云。<sup>⑦</sup>

《溧阳县志·清詹事史貽谟传略》亦载:

① 释含澈《程雨琴观察妙香轩集唐诗序》,《潜西偶存》,清咸丰六年(1856)新繁龙藏寺绿天兰臭刻本,第4A页。

② 何绍章修、冯寿镜纂《丹徒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566页。

③ 侯俊德、吕菘云等修,刘复等纂《新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12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45页。

④ 孙雄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⑤ 张凤喈等修《南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5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⑥ 屈守元《蜀秀集跋》,《文史杂志》1996年第5期,第34页。

⑦ 陈仕林纂《大竹县志》卷十,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第47A页。

(乾隆)二十一年,分校顺天乡试。寻出督学四川。时科场新增律诗,边方士子或未谙声病。

(史贻谟)至则谆切讲贯,咸知究心,尤以简拔真才、厘剔宿弊为务。疏入,朱批嘉奖。<sup>①</sup>

乾隆年间,江南名士史贻谟在四川考试学子时发现,很多学子竟然不通声律,不得不为他们悉心讲解。造成清代中期四川士子不通声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在此不作过多探讨,但由此可以看出清代中前期四川诗歌中声律不整、夸诞诡怪的现象的确是客观存在的。正是因此,张之洞入蜀之后才创办尊经书院,大力倡导实学,并延请一代名儒王闿运为山长,以此扭转四川地区空疏的学风与浮夸的诗风。晚清蜀人林思进曾就清代四川诗风的转变云:“大约蜀经荒乱之后,世家陵替,其学问类无所承,即以诗歌而论,自康熙以迄咸同,性灵才华之为用多,而格律宗流之讲求少。南皮张文襄督蜀学,深加董劝,风气乃稍稍一变。”<sup>②</sup>而谭宗浚编纂《蜀秀集》的目的自然也在于此,其遴选的几组拟作之诗,很明显便是针对当时四川士子不通声律的毛病而有意为之,试图通过川中士子的佳篇美什起到示范作用,来扭转蜀中夸诞张扬的诗风。

谭宗浚自光绪三年(1877)任四川学政伊始,便着手收集资料,直到光绪五年(1879)《蜀秀集》才成书付梓。谭宗浚在《蜀秀集序》中云:“今者诸生淬掌专精,斋心嗜学,岁历三稔,制逾千篇,爰汇菁华,都为一集。”<sup>③</sup>此集费时三年方成,可见谭宗浚之用心。《蜀秀集》有光绪五年(1879)成都试院刻本,其中卷八、卷九共收录238首诗作,此后尊经书院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据原版翻刻,2015年被辑入《巴蜀珍稀教育文献汇刊》中。

## 二 本地士绅

与入蜀官员丕振文风的出发点不同,四川本地士绅则是在桑梓情怀的驱动下,大力编纂诗歌总集以光大乡邦文献,表彰乡贤人物。他们有些曾是在外求学或为官的耆旧显硕,还有一些则是足未出省的落魄乡绅,彼此之间身份地位、生平阅历以及经济状况的差异,使得他们在编纂清诗总集时既有着各自不同的出发点与侧重点,又制约着这些总集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水平,使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艺术旨归。

编纂《全蜀诗汇》的张邦伸、《国朝全蜀诗钞》的孙桐生、《诗缘》的王增祺、《符江诗存》的李超琼均有在外为官的经历,而《蜀雅》的编纂者李调元则不仅在北京、广东等地有多年的仕宦资历,更有在江南遍访名师的求学经历,丰富的人生阅历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诗学视野与审美情趣,而他们所编纂的诗歌总集自然也成为了精品之作。

首先,他们基本上都有着地方史志或诗文总集编纂经历,这为他们编纂四川清诗总集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使得他们编纂四川清诗总集时得心应手,取法有度,编纂出的诗歌总集自然体例严谨、规制细密、评点精审、详略得当。张邦伸在河南先后历任光州(今光山县)州判、襄城知县、固始知县等职,其在襄城时编有《光郡通志》68卷(又名乾隆《光州志》),其《云谷年谱》载:“(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三十四岁,正月交卸回光,是岁借帑修理乌龙集衙署,并代纂《光郡通志》六十八卷。光郡初无志,余广加采访,潜德幽贞,多所表扬云……”<sup>④</sup>此后张邦伸调任固始县令,在任期间又编纂了《固始县志》26卷。除了地方史志的编纂经历以外,张邦伸在代署襄城县令期间,与当地士绅秋实合选襄城地区的诗歌总集《汜南诗钞》4卷,共收襄城县清初至乾隆元年(1736)诗人72位(包括闺秀、流寓、方外等),诗889首。张邦伸辑选《汜南诗钞》的经历,为其编纂《全蜀诗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蜀诗汇》“以人系诗”的编排体例、“生人不录”的选择标准、“表彰胜朝”的价值评判等,都直接脱胎于《汜南诗钞》。《蜀雅》的编纂者李调元任广东学政期间辑有当地歌谣类总集《粤风》4卷,还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辑有《全五代诗》100卷,其序云:“五代诗向无全本……统名之曰《全五代诗》,共计书一百卷,自乙未春二月至戊戌春正月,积三年而始成。虽草创经营,不无坦率,而獭祭之下,颇自信摭拾无遗,庶几使五十二年之文献得以不坠,不亦可乎?”<sup>⑤</sup>从李调元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其从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开始搜辑资料,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全五代诗》才编成,中间耗时三年,《全五代诗》

①李景峰、陈鸿嘉修,清史炳、史津纂《溧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3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②陈法驾、叶大镛等修,曾莹、林思进等纂《华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76页。

③谭宗浚《蜀秀集》,《巴蜀珍稀教育文献汇编》第32册,成都时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④张邦伸《云谷年谱》,清嘉庆九年(1804)刻本,第8B-9A页。

⑤李调元《童山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19-520页。

亦被后世认为是五代诗较好的辑本。此外,李调元还编有《函海》、《续函海》两套囊括经史子集的大型丛书,而孙桐生、王增祺、李超琼等人在外为官期间也都有参与地方志编纂的经历,有着丰富的编纂经验,这些经验为他们编纂四川清诗总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这些在外宦游的官员都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这一方面为他们编纂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使他们心无旁骛、从容不迫地开展编纂工作,从而确保质量;另一方面,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使得他们不仅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亦有着更为广大的交游圈,提升了他们对诗歌的审美与鉴赏能力。李调元少年时随父出川,分别跟随陈沅、查梧冈、陆宙冲学习时文、诗法和书画。他在《雨村诗话》中云,“余诗学授于海宁查梧冈先生,而科举实得力于钱塘陈学川先生沅,美须髯,长身鹤立,古貌古心。癸酉(1753),余随任余姚,先生初中是科副车,先北路公闻其时艺首称宗匠,因延请课余于署之六不斋西。自是余文始有法”,“秀水陆渔六宙冲,工诗画,先北路公曾命余从学画”<sup>①</sup>。此外,李调元还在其父的引见之下,跟随与沈德潜并称为“江南二老”的钱陈群学习诗法:

大司寇嘉兴钱文端公香树,诗名与长洲尚书沈归愚齐驱。以老告休,在籍食俸,异数也。丙子,先北路公为秀水令,文端见余,器之,命受业门下……自是遂授以诗法。后予以己卯乡试第五名,癸未会试第二名,入翰林,报到,公笑曰:“余所赏识,固不谬也。”<sup>②</sup>

除了跟随这些业师学习,李调元还接受过施沧涛、黄证孙、徐琰等江南名士的指点。在众多名师的引导之下,李调元的诗歌创作水平与诗歌鉴赏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雨村诗话》载:

海宁太史查云在祥,康熙戊戌进士,曾举博学宏词,余业师梧冈先生之父也。书法仿董思白,余家藏有《采桑图》,题诗其上,今已为人掬去。云在先生诗刻意奇峭,……梧冈先生甲戌进士,由户部郎出守池州,归。诗本家法,格律谨严,有批点元人《瀛奎律髓》,深恶诗眼之非。余在平湖,曾授余读之,大抵论诗以风韵、神韵为主,而气必雄浑,词必典丽,余诗得先生而益进。<sup>③</sup>

李调元在江南的求学与交游经历,为其之后的成名进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则不可能支撑其四处求学的巨大花费。乾隆四十八年(1783),李调元因故下狱,被判发往伊犁充军,后蒙友人搭救,获准缴纳赎金代罚,其家人在两个月内便捐金两万两替其赎罪,由此可见李调元家资之丰厚。李调元悬车致仕之后在罗江老家扩建醒园,一时成为蜀中名园。李调元在园中筑有万卷楼,专门收藏其从江浙、北京等地购入的图书,此外他还编纂了《函海》和《续函海》两部大型丛书,若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后盾作为支撑,李调元很难完成这些卷帙浩繁的大型文献的编纂工作。而张邦伸、孙桐生、王增祺、李超琼等人虽然没有李调元那样殷厚的家底,但他们在外省均有多年的宦游经历,因此经济上较为富足,并且与当时诗坛中的知名人物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无形之中提升了他们对诗歌的领悟力与鉴赏力。

而相比之下,那些足未出省的本地乡绅,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人生阅历,都远远比不上那些曾外任实缺的耆旧硕望。如编纂《桂溪耆旧集》、《国朝全蜀诗续钞》的李炳灵,其祖上虽也是垫江地区的名门望族,但到李炳灵这一代则明显走向了衰落,李炳灵中举之后会试屡试不第,后以举人身份在德阳、成都等地担任教谕这种微末闲曹,终身足未出省,经济状况也捉襟见肘。其在编选《国朝全蜀诗续钞》时,为解决刊刻的经费问题,便约新繁龙藏寺方丈释含澈同选。《国朝全蜀诗续钞·序》云:

余瑟居多暇,不揆樗昧,搜辑名流佳什,多者则汰之以精选择,少者则存之以传姓名。积久成帙,用资观感而备遗忘。但学殖荒落,家少藏书,草创之余,不无窒漏。去年秋薄游繁江,晤雪堂上人,谬辱知爱,谓可与言,并见示所辑《及见诗钞》《方外诗钞》暨《绿天兰若》等集。龙藏古刹,坛坵千秋,觉莲社风流去人未远。因出是编商榷,并约同选,上人欣然见许,为之订正补遗,付诸手民。<sup>④</sup>

李炳灵“学殖荒落,家少藏书,草创之余,不无窒漏”这一描述虽有自谦的成分,但亦从中可以窥见其家庭经济的窘困。正是迫于刊刻经费短缺的压力,李炳灵才不得已向释含澈求助,邀请其同选以促成此书,而释

①李调元著,詹杭伦、沈时蓉校正《雨村诗话校正》,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35、96页。

②李调元著,詹杭伦、沈时蓉校正《雨村诗话校正》,第27页。

③李调元著,詹杭伦、沈时蓉校正《雨村诗话校正》,第121—122页。

④释含澈、李炳灵辑《国朝全蜀诗续钞》,《巴蜀珍稀文学文献汇刊》第27册,成都时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452—453页。

含澈的加入则直接导致了《国朝全蜀诗续钞》编选质量的下滑,其不仅在该集大量收录自己的作品,而且所录之诗人半为友朋故旧,所录之诗几乎尽为酬酢吹捧之作,如其所录邬杰《读释雪堂诗奉怀》:

未见雪堂面,早闻雪堂名。常存安济愿,遵循大朗行。天假诗教通儒理,先钟诗骨与诗情。情  
悱恻,骨峥嵘,心既远,神复清。惠休玉朗朗,贾岛金铮铮。多援二子来窃比,只恐前贤畏后生。开  
诗境,播诗声,选佛场中旧高隐,选诗坛上新主盟。迩来飞出诗怀弥广大,不特近世诗王、诗霸与诗  
卿,直兼诗史、诗豪、诗仙、诗佛……<sup>①</sup>

在这首诗中,邬杰对释含澈极尽吹捧之能事,不仅将释含澈与惠休、贾岛相提并论,还放言“只恐前贤畏后生”,在最后甚至口号式地喊出释含澈“不特近世诗王、诗霸与诗卿,直兼诗史、诗豪、诗仙、诗佛”。如此露骨的标榜之作,倘若含澈将其收入自己的别集中倒也无伤大雅,但公然选入总集之中,使得《国朝全蜀诗续钞》所录诗歌无论是文学价值还是文献价值,都无法与《国朝全蜀诗钞》相提并论,作为续补之作而言,这无疑是相当失败的。

此外,由于本地士绅久在川中,与主流诗坛的沟通与交流相对较少,故而他们对诗歌艺术价值的理解与感悟,与李调元、张邦伸、孙桐生、李超琼这些曾在外游宦的川籍官员相比起来,自然有云泥之别。因此,他们所编纂清诗总集往往是“辑而不选”,要么抄录本地方志中艺文志的诗歌部分而撮录成书,如李超琼的《符江诗存》便是基本上抄录同治《合江县志·艺文志》中的诗歌部分;要么是大量收录与自己姻亲友朋的诗作,如李炳灵的《桂溪耆旧集》。总体而言,他们所编纂的诗歌总集的艺术品质,是无法与那些曾在外游宦的耆旧硕望所编纂的诗集相提并论的。

### 三 蜀地诗僧

清代四川地区除了入蜀官员与本地耆旧乡绅投入到清诗总集的编纂活动中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对清诗总集的编纂十分热心,那就是方外僧侣。方外僧侣编纂诗歌总集始自唐代释法钦辑《唐僧诗》,此后历代多有僧侣编纂的诗歌总集问世。清代是诗歌总集编纂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方外僧侣所编纂的诗歌总集数量庞大,远远超过了前代。而清代四川的僧侣更是突破了“方外人编方外诗”的定势思维,所编纂的诗歌总集门类齐全,数量繁多,新繁龙藏寺住持释含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释含澈,俗姓支,四川新繁龙藏寺僧,少时家贫,其父支传新将其送至龙藏寺为沙陀,师从住持云坞法师。云坞法师,法名崇远,字性明,晚号云坞老人,民国《新繁县志》称其“旁通经史文辞及奇门壬遁、岐黄青鸟诸书,主邑僧会者殆三十余年,卒年六十三,著有古今体诗二卷”<sup>②</sup>。释含澈自幼跟随云坞法师学习诗法,其在所选《方外诗选》序中言:“余少时,先师云坞老人手书诸名僧诗教余,唯诵以当课程,诫曰:‘儒家诗教陶淑性情,与佛门禅悦相表里,汝等小子不可不学矣。’”<sup>③</sup>正是在云坞法师的悉心教导之下,释含澈自幼便对诗歌充满了热爱,其平生不仅热衷于诗歌创作,主动与川中文士交游酬唱,同时积极收罗蜀中诗歌文献并刊刻成书,以展示乡邦诗风与地方文治,民国《新繁县志·释含澈传》称其“性喜表彰幽隐,凡朋辈诗文、前人遗墨,咸为刊布,勒石以广其传”<sup>④</sup>。释含澈一生著述颇丰,除自著诗文集若干部外,还刊刻了数部蜀中前贤及友朋诗集,并编选了《国朝全蜀诗钞续》、《费氏诗钞》、《方外诗选》、《及见诗钞》、《及见诗钞续》、《绿天兰若诗钞》等六部诗歌总集。其中,《费氏诗钞》收录清代四川费经虞、费密和费锡璜祖孙三人诗歌,为家族类清诗总集。《方外诗选》为释含澈“汇集历代僧人之诗,次第统编”,共八卷,收唐寒山以后历代诗僧之诗,诗人以年代先后依次编排,诗人名下之诗作则按诗体编排,先列五七绝,再为五七律,最后为古体,这种分体编排的方式与传统的诗歌总集分体编排有所差异,释含澈在全书最后跋语中对此专门解释道:

兹复赘此者,为作吾徒学步之资也。至编诗之法,原以五七古为最,五七律次之,五七绝又次之。吾之倒用五绝七绝为首者,非敢有意违古,实有不得已之苦心。取五七绝,字句短少便于初学,

<sup>①</sup> 释含澈、李炳灵辑《国朝全蜀诗续钞》,《巴蜀珍稀文学文献汇刊》第28册,成都时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sup>②</sup> 侯俊德、吕菘云等修,刘复等纂《新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12册,第181页。

<sup>③</sup> 释含澈《方外诗选序》,光绪三年(1877)新繁龙藏寺绿天兰若版,第1A页。

<sup>④</sup> 侯俊德、吕菘云等修,刘复等纂《新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12册,第182页。

容易入门,殆亦循诱之意,识者原之。<sup>①</sup>

释含澈的跋语中透露出辑选《方外诗选》的宗旨是为了方便其徒弟学诗,故而一违常例,将浅显易懂的五七绝句编排在前,使其徒弟如融琢、徒孙永长等诸人能够由浅入深地掌握诗歌韵律格调与创作技巧。释含澈如此苦心安排,可以看出其对诗歌的熟谙和热爱,他将诗歌视为与佛经同等重要,让徒子徒孙时刻诵习,在龙藏寺的僧人群体中掀起了一股学诗作诗时尚风潮。

《及见诗钞》及《续钞》是释含澈有感于前贤诗歌散佚过快,因此在平时与文士诗人交往过程中,他特别留意收集整理有关诗作,“间闻所及,辄录笥篋板而存之”,同时凡“友朋录寄”<sup>②</sup>他也悉心整理编纂,以期将来完成其表彰前贤、嘉惠后世的宏愿。

正因如此,《及见诗钞》也与同时代的清诗总集体例存在较大的差异。《及见诗钞》与《续钞》均既不依所录诗人时代先后编次,又未依诗体分类编排,而是依照其得诗时间先后编排。含澈在《及见诗钞·例言》中云:“古今选诗,各抱卓见,才情风格,取舍因人。澈雅非知音,窃耽讽诵,见闻所及,辄录笥篋板而存之,备遗忘也。若云选家,非澈所敢……诗钞之体,作者、时代、姓氏、爵里一宜璨然大备,澈鄙陋之见,多所未详,至编次则以得诗之先后为序也。”<sup>③</sup>正是由于含澈采用了随到随录的编排方式,《及见诗钞》和《续钞》中才保留了大量已亡佚的诗人诗作,其中很多诗人的诗集在含澈编纂之时便已经散佚,如《及见诗钞》卷2所收杨周冕之诗78首,含澈在其诗后有跋语:

铁崖先生诗集极富,散佚不可多得。兹刻于先师所藏外,半得于高伯元、罗书坪、叶翊亭诸君子之手也。后有得者,当即补入,成完璧焉。<sup>④</sup>

又如《及见诗钞》卷五所录“柳下野人”之诗,乃是含澈从其邑人康藜阁所藏清初稿本中抄录而出,此本自清初至彼时两百余年间未有刊刻流传,且在官私目录中均无著录,含澈将其诗歌单列为一卷,在其诗人小传中指出其诗歌风格“有汉魏音响”,并在卷末附有跋语“野人诗尚富,未及尽刊,其稿已璧完康氏去。好古君子欲窥全豹者,知乡往焉”<sup>⑤</sup>。《及见诗钞》成书以后,含澈并未停止诗歌的收集工作,依然几十年如一日继续访求老友友朋,四处搜寻散佚诗作,在光绪十九年(1893)含澈70岁高龄之时,刊刻出版了《及见诗续钞》。

除释含澈以外,清代四川地区还有诸多僧侣,他们与当地官员、士绅结社唱和,酬酢吟咏,以诗文弘佛法,被誉为“诗僧”或“雅僧”,他们常将此类唱和诗作结集出版,成为当地诗坛的韵事佳话。光绪《铜梁县志》载:

释悟贤号愚岭,周姓,襁褓多疾,寄养空门。比长,家贫,父没母改适,贤因披衲寿隆寺,六寅波仑皆所住锡。又尝云游东南,用益工于吟咏,与同里廖先达、王明诚、左昌华、吴乃廉暨合州张乃孚、禹湛,巴县龚有融诸名士结社赋诗,极一时韵事,著有《六寅唱和集》,又自著《海山诗》一卷,国朝县中雅僧以愚岭称首云。<sup>⑥</sup>

释悟贤常与当地诗人结社唱和,被铜梁士绅称为“雅僧”,《六寅唱和集》便是收录其与当地士绅结社吟咏六寅山景诗作的唱和集,此集今已亡佚,仅有龚有融之“八景诗”存于光绪《铜梁县志》中。该志中还收有合州张乃孚《六寅山八景唱和诗序》以及巴县龚有融《题六寅集》,张乃孚在序中云:

夫千岩万壑,非游览无以著其灵;三泖两峰,非诗歌何以博其趣……有僧名愚岭,勿忝惠勤之俦,锡卓空山,实启远公之社。由是骚人、逸士接踵而来,羽客名流,磨崖以待禅心,不逐狂絮,茆屋可赋新诗。人各八章,汇为一集……遂与门人辈,各赋古近体五七言若干首,并附卷中,略加叙次焉。补名山之缺,聊当斋僧;参摩诘之禅,遽云呈佛。庶几命诸剞劂,必永东林圣善之流传;贮以缥緜,足振太保中丞之壮采。<sup>⑦</sup>

①释含澈《方外诗选》卷八,光绪三年(1877)新繁龙藏寺绿天兰若版,第95A页。

②释含澈《及见诗钞·例言》,咸丰六年(1856)新繁龙藏寺绿天兰若版,第1A、2A页。

③释含澈《及见诗钞·例言》,第1A—1B页。

④释含澈《及见诗钞》卷二,第21A页。

⑤释含澈《及见诗钞》卷五,第20B页。

⑥韩清桂、邵坤修、陈昌等纂《铜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757页。

⑦韩清桂、邵坤修、陈昌等纂《铜梁县志》,第879—880页。

从张乃孚的序中可以看出,《六寅唱和集》所录之诗实际上是社中诸人对六寅山八景的吟咏,而释悟贤所在的六寅山寿隆寺则是诗社的聚集地,由此也可以看出释悟贤在诗社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

清代四川像释含澈、释悟贤这样的诗僧还有很多,其中顺庆府岳池县华银山伏虎寺(今四川广安岳池县华莹山)的释昌言便较为知名。光绪《岳池县志》记载:“昌言号虎溪,年二十二,礼伏虎寺僧觉鉴为弟子,志行珪洁,尝与巨公名士往来唱酬,有唐四僧风,著有《虎溪诗稿》三卷,并手辑《银山志稿》、《华银诗钞》行世。”<sup>①</sup>《华银诗钞》又名《游华银山诗钞》,是释昌言与孙桐生等人的唱和诗集。咸丰五年(1855),释昌言邀请孙桐生、顾霁崖、李克生等文人同游华银山,孙桐生《生平大事记》云:

咸丰五年,岁在乙卯,三十二岁。武静山同年部选岳池令,二月以书币来聘予主讲凤山书院……讲贯之暇闲,游览山水,以消块垒。虎溪上人能诗善书,邀予与顾霁崖、李克生、复初上人同游华银山……沿山诸景,若东林寺、白云庵、黄龙庵、薄刀岭、三百梯、千佛坪、之字径、铁瓦殿、龙井、蟹泉诸胜地,皆有题咏纪之。另有《游山记》一篇,七古长歌一首写赠虎溪上人。《华银八景》与各诗僧游侣唱和之作,约四五十首,都为一卷。霁崖捐资剞劂,名曰《游华银山诗钞》。<sup>②</sup>

孙桐生与释昌言等人在华银山上谈诗论道,相互唱和,宾主之间欢悦无限,孙桐生作有《游华银山记》及诗作 27 首,释昌言等人亦有 20 余首和诗,由释昌言将其集为一卷,名曰《游华银山诗钞》,由顾霁崖捐资付刻。孙桐生后在辑选《国朝全蜀诗钞》时,所录释昌言之诗均是从两人书信往来中采录,孙桐生在释昌言人物小传中云:“予以乙卯秋假馆,和溪秋间为华银之游,实与虎溪为文酒之会,探幽选胜,联吟赋诗,曾有《游华银山记》附以游山唱和诗,颇惬一时方外之趣。迨后出宰湖湘,闻虎溪亦已示寂,求昔年唱和游山之作,杳不可得,皆为友人携取,无从寻觅,仅就见赠及书赠者著录,亦可想其襟怀潇洒无蔬笋气矣。又虎溪与顾霁崖为唱和良友,其警句有‘月明野鹤还山易,风定闲云出岫难’。人服其高雅名贵,今虽所存不多,然吉光片羽,亦可以窥见风趣矣。”<sup>③</sup>孙桐生对释昌言十分推崇,称其“襟怀潇洒无蔬笋气”,其《游华银山登绝顶长歌赠虎溪上人》诗云:“同行更结方外友,来携齐己访贯休。”<sup>④</sup>他将昌言比作唐代著名诗僧贯休,对于此次与其同游华银山谈诗论道十分惬意,与昌言建立了终身的友谊。同治二年(1863)年,孙桐生外任为官时还专门寄书昌言云:“仙原远隔,问津无由,月夕花晨,倍萦离绪。回忆当年,诗酒怡情,此心能毋惜惜?迩来遥念法社多佳,拈花微笑,时又未知助多少佳句耶?”<sup>⑤</sup>除与孙桐生交情匪浅以外,释昌言还与时任岳池县县令武尚仁经常往来,结社唱和,为岳池当地诗坛之雅事。武尚仁将其视为挚友,并亲为其《虎溪诗稿》作序,称其诗“发之歌咏,独抒性真,不标榜汉魏,自然声希味淡;不依附晋唐,自然力果神完;直驾宋元而上,之是能自成一家,人之杰亦地之灵耳”<sup>⑥</sup>。释昌言《虎溪诗稿》中的诗作,多是吟咏华银山景及与士人唱和之作,武尚仁对其诗歌风格与成就的评价难免滥入溢美之词,但释昌言对诗歌的热爱与喜好,对风雅的执着与崇尚,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其编纂清诗总集的内在动因。

综上所述,在四川清诗总集的编纂活动中,倾心地方文教的川籍士人是绝对的主力军,而入川游宦的官员、身处方外的僧侣或以政治权力积极响应,或以投入金钱为之助力,甚至还亲自参与到编纂活动之中。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给后人留下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唐 普]

①何其泰等修、吴新德纂《岳池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59 册,巴蜀书社 1992 年版,第 218 页。

②孙桐生《生平大事记》,转引自:王兴平、杨培德编《孙桐生研究》,巴蜀书社 1993 年版,第 386 页。

③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巴蜀书社 1985 年版,第 724 页。

④释昌言《华银山志》,《中国佛寺志丛刊》第 119 册,广陵书社 2011 年版,第 546 页。

⑤释昌言《华银山志》,《中国佛寺志丛刊》第 119 册,第 367 页。

⑥释昌言《华银山志》,《中国佛寺志丛刊》第 119 册,第 291 页。